

回顧一場幾乎被遺忘的論爭 ——「新權威主義」之爭述評

◎ 盧毅

大約20年前，中國思想界曾經發生了一場圍繞「新權威主義」的論爭。它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卻充分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對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對其進程亦起到相當的影響，甚至延續至今。在論爭日趨熱烈之時，相關報導頻頻見諸報端。但時過境遷之後，近20年來則幾乎無人提及，這顯然是與其地位不相稱的。故本文擬對這場幾乎被遺忘的論爭，進行一番回顧和反思。

一、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產生背景與理論淵源

新權威主義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驟然興起，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和理論淵源。19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改革主要是圍繞著經濟上的分權與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展開的，但從一開始就涉及到調整政企關係、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因此必須進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項改革長期沒有深入展開。80年代中期，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舉措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已初現端倪，解放思想的觀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並在知識份子中開花結果，思想界呈現出一種多元化趨勢。但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伴生的一些問題也慢慢浮出水面。例如在對地方分權的過程中，地方財政能力不斷擴張，而中央財政能力卻不斷萎縮，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護主義，「諸侯割據」嚴重，中央難以從全局上控制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在80年代後期出現了物資緊缺、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經濟紊亂的局面，並由此引發了官倒橫行、分配不公、社會犯罪猖獗等現象。

面對這種局勢，一些知識精英開始憂慮和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應該怎麼走。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以上這些現象都是由失範性危機造成的，也就是政府放權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失控。他們同時還擔憂這些負面問題勢必引發普遍的社會不滿，而這種不滿反過來又會嚴重削弱政府的威信，從而更進一步加劇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失控。他們因此主張，為了走出這種改革困境，必須賦予改革者更多更大的權威。恰在此時，1988年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整頓的任務。在這些人看來，這無疑是政府準備加強權威的一個信號，於是倍受鼓舞，要求中央運用強力嚴厲制衡地方經濟活動，改變無政府狀態，維持社會穩定。當時有人便觀察到：「去年下半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關於治理、整頓的任務甫經提出，宣揚『新權威主義』的聲浪驀然升高，同時引起了自發的爭鳴。」¹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還有著深刻的外在背景。一是蘇聯東歐改革的壓力，特別是戈巴

契夫（Gorbachev）強力推進的新思維改革，給中國思想界以極大的刺激，強化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新權威主義心態。二是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在當時備受關注，成為一些人心目中的改革樣板。而幾乎無一例外，四小龍的政治範式都是偏重權威的，這似乎也為新權威主義提供了充足的實踐依據。

這一時期，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Huntington）的學說也日益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關注，成為了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淵源。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中，對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和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來的歷史，指出二點帶有規律性的現象：第一，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開始之初，都經歷過由新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聯合或單獨實行專制的階段，這種專制促進了自由經濟的發展；第二，幾十年來，一些不發達國家由於過早模仿西方的現代民主，造成社會動盪、戰亂頻仍、腐敗現象嚴重，反而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所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當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人民政治參與程度卻很高時，就容易出現政治不穩定，為了保持政治穩定，必須集權于精英，而限制政治參與，以便通過專制實現經濟現代化。亨廷頓甚至還提出一句名言：「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²這種觀點自然對一些國內學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導向，他們紛紛引之為奧援，為新權威主義張目。

二、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據其代表人物吳稼祥介紹，1986年，他在上海就聽到眾多青年學者談論政治精英，談論現代化過程中的集權作用，談論東亞諸國和亨廷頓。時任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王滬寧曾有一份報告，力陳改革必須有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當時，北大博士生張炳久也在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舉辦的沙龍講演上，主張我國現階段應採用半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以適應發展中的商品經濟需要。這些思想剛開始時被視為有悖於民主化進程，受到了理所當然的冷遇，幾乎無甚反響³。

時至1988年，思想界日趨活躍，而新舊體制不戰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國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日益嚴重，新權威主義緣此東山再起。6月，在中宣部研究室召開的座談會上，張炳久重申他兩年前的主張，認為中國當務之急是使社會生活兩重化，即經濟上實行自由企業制、政治上實行集權制。他認為，從經濟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中間尚需必要的歷史環節，只有在商品經濟相當規模的發展中，這些環節才能提供出來，成為多元政治的社會基礎。在這個階段，籠統地提出民主，過早地採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運行機制是不聰明的。比較起來，由一些具有堅定的政治目標又不性急冒進的政治精英採取強制性的手段，穩步推行市場經濟，並在此過程中為實現多元民主制創造條件，可能是一條更為可行也更穩妥的選擇，即實行「半集權制」⁴。他還批評說：「民主制要經過歷史的發育。一些激進的人們不明白民主制尚須有歷史發育的過程，因而有立即實行普選、議會政治、多權分立等等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其效果卻會是欲速則不達。」⁵

同年7月，上海學者蕭功秦在北戴河舉行的知識份子問題學術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新權威主義」這一概念。他將新權威主義歸於過渡性權威主義的一種，認為它是有別於開明專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政治模式選擇。具體的說，「新權威主義是指第三世界

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早期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形態。」選擇這種政治形態，是這些國家在現代化初始階段面臨的發展經濟、健全法制、整合社會、維持社會穩定等諸多因素決定的。所以，儘管新權威存在著一定的禍害，然而卻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禍害」⁶。

與此同時，時任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的吳稼祥也在〈新權威主義述評〉、〈再談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研究提綱〉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統闡述了對新權威主義的認識，提倡以新權威主義推進穩健民主。他認為新權威主義與傳統集權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中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剝奪還是保障個人自由，是新舊權威主義的分水嶺。」⁷在論證新權威主義的必要性時，吳稼祥首先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他認為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走向現代都必須經歷新權威主義，國際經驗中沒有任何國家提供過首先建立現代化議會民主政體可以反過來更快地推進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的成功例證。相反地，我們從中國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場化到來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導致分裂混亂、幫會政治或軍閥割據。由此可見，新權威是避免彎路，迅速通過市場化開往民主化的特別快車⁸。為了表明觀點，吳稼祥還形象地打了一個比喻：「在民主與自由『結婚』之前，有一段專制與自由的『調情期』。如果說民主是自由的終身伴侶，則專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⁹1989年2月，《理論資訊報》與北京社會與科技發展研究所聯合舉辦了「當代政治思潮中的新權威主義」討論會。在該會上，吳稼祥仍然是新權威主義的積極提倡者。他認為，民主只有在市場化的基礎上才能健康運行，但市場運行需要在經濟與政治分離的條件下實現。而這種分離靠擴大公眾參與是不行的，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靠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會逃避市場，或片面受某種利益集團的操縱而分割市場，因而必須由理智、堅定、具有現代化意識的權威來實行有力推進¹⁰。

這一時期，另外一些學者也開始贊同新權威主義。1988年9月，在紀念百日維新失敗90周年的座談會上，戴晴便公開提出中國大陸的改革和現代化需要政治強人，就類似於近幾十年來在東亞諸國和若干地區產生的那種政治強人。楊百揆在〈政治發展中的民主和權威〉一文中，也闡述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需要過渡，這種過渡需要開明的新的政權，而如果首先進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必然帶來矛盾¹¹。陳一諮等人甚至在〈建立「硬政府，軟經濟」的發展模式〉一文中直接指出，由於經濟文化水準落後，絕大多數民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無法直接管理國家的，實質上只能是一種「精英政治」，即少數精英分子居於領導地位，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把握國家的發展方向¹²。針對人們將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對立起來的認識，劉東華還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澄清說：事實上，新權威主義者是從民主的幻像中醒了過來，轉而致力於尋找一條抵達民主政治的現實通道。如果說「新權威」政治是一座橋的話，那麼，它是中華民族無以回避非過不可的橋¹³。

總之，新權威主義此時已經被許多學者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廣泛運用。儘管他們關於這一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關注問題的層次角度與論證方式也稍有差異，但是都具有相似的集權或半集權的政治主張，普遍贊同新權威主義是落後國家在現代化早期所經歷和實行的一種政治形態。他們認為因為缺乏民主力量，無法用民主政體來控制整個社會，而為了達到現代化的目的，就必須要建立權威或集權的政體以推進整個社會的發展。所以，當前在政治領域中所進行的改革任務，主要不是推進政治民主化而是實行必要的政治集權和政治壟斷。以這些觀點的出現為標誌，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可謂蓬勃興起了。吳稼祥當時即曾充滿詩情地描繪說：「有一個奇怪的精靈拍打著翅膀，已然穿過思想界的森林，它就是新權威主義思

三、論爭的發生與發展

1988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上，剛剛興起的「新權威主義」遭到了猛烈的批評。一些學者稱它本身就是一種「偽論」，是建立在對當權者的「善意」信任的不穩固的基礎之上，他們因此呼籲要進行民主的新啟蒙，而這派觀點又被新權威主義者稱之為「政治浪漫主義」。這就在中國思想界出現了「新權威主義」與所謂「政治浪漫主義」的分化與對立，揭開了新權威主義之爭的序幕。1989年1月16日，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同時刊登吳稼祥的〈新權威主義述評〉與人大博士生榮劍的〈「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二篇觀點對立的文章，新權威主義之爭由此首次公諸報端。

榮劍在文章中對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可行性提出懷疑，進而加以了否定。他指出，在目前改革陷入極大困境時宣揚「新權威主義」，從學術動機上估價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把這種主張立即付諸政治實踐，則有可能促成改革的全面退卻。他還進一步強調，集權政治和自由經濟協調關係的存在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即「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化」，而這種情況在中國現實中是不存在的¹⁵。

黃萬盛在對《文匯報》的訪談錄中同樣嚴厲批判了新權威主義。他認為，新權威主義的基調是專制主義的舊夢重溫。所謂「新權威」，其基礎並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而是否定民主，不如徹底標明為「新專制主義」。而中國歷史最根本的教訓是權力太過集中，因此改革的重要課題應當是權力社會化、民主化。他還指出，有人欣賞戈巴契夫消除改革阻力的果斷做法，但蘇聯的改革其實近似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改革，「實在沒有必要因為看到蘇聯今天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為中國的改革感到自卑。」此外，亞洲四小龍已成為當代中國改革中保守主義思潮的護身符，這是一個可悲的現實。其實，斷定東亞的起飛依仗了政府專制，這是大可懷疑的。南朝鮮的「光州事件」，臺灣的「高雄事件」，菲律賓的反獨裁，新加坡的民主政治潛流，都說明民主在東亞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而新權威主義無視這個最主要的社會走向，卻把從來沒有被嚴肅論證，關於「東亞模式」的直覺假定作為依據，未免有些輕率。至於有人把西方一些政治學說拿來作依據，這也存在局限性。我們的基本態度應是認真研究，但也不要輕信盲從，應當認識到理論同中國現實的差距¹⁶。黃萬盛的這番話顯然是針對新權威主義的興起背景和理論淵源而發。

當時，有許多學者都對新權威主義所依據的思想背景和現實例證進行了批駁。于浩成在〈中國需要新權威主義嗎？〉一文中指出，以亞洲四小龍為例來論證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可行性，這根本是牽強附會的。因為亞洲四小龍都是自由經濟，而且是外向型經濟，受國際市場的強烈制約，其本國或地區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作用微乎其微。這同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主要是產品經濟，經濟受政治的嚴密和強烈控制的情況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呢¹⁷。郭蘇建則在〈評新權威主義的誤區〉一文中對新權威主義興起的國內背景進行剖析，認為諸如社會腐敗現象、通貨膨脹、秩序混亂、農業生產滑坡、基礎工業滯後、教育落後等問題，並不是一個權威喪失的問題，更不是需要呼喚「專制機構」這種「新權威」的問題，而是一個繼續深化改革，進行產權革命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¹⁸。

除了質疑新權威主義的可行性和背景淵源之外，同時還有一些學者對其未來後果也表示擔

憂。遠志明就提出疑問：「新權威新就新在掌權者是具有現代化頭腦、民主意識和高度政治權能的一個或一批精英。我們用麼麼保證出現的權威主義是新的而不是舊的？」¹⁹韓水法也明確指出：「新權威主義者也吃不準這些治國者到底能否按照他們美好的意願來完成預定的歷史任務。無論是蕭功秦還是吳稼祥都意識到，即使他們理想化了的新權威主義治國者也有極大的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相反的作用。有無對付的辦法呢？蕭功秦以兩難的選擇來搪塞，而吳稼祥則表現得毫無成算，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態度，冀圖讓危機來消滅作惡的專制人物。假如運氣不錯，將會贏得一個現代化和『整合了的社會秩序』。可是，先生，如果運氣不佳呢？」²⁰而岳麟章、鄭永年更是深刻分析說：「從長遠一些看，新權威主義所規劃的現代化道路，很可能是一條暴力的現代化道路。……一旦新權威佔了絕對統治地位，那麼它便成為一種既得利益者，即使這種既得利益養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推動了經濟現代化，扶持了中產階級，具備了實現民主政治的一些條件，但誰也無法保證既得利益者能把巨大的權力交給人民，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如果真是那樣，就很有可能導致一場暴力革命²¹。

從這一時期的爭論態勢來看，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層出不窮，而支持新權威主義的人則寥寥無幾。根據吳稼祥後來提供的名單，參與批評與批判的人有：曹思源、陳新權、丁寧寧、杜汝楫、范忠信、馮英子、高光、高放、顧昕、戈揚、郭蘇建、黃萬盛、黃秋耘、胡績偉、韓樹英、韓水法、姜先星、李澤厚、李盛平、李景鵬、李一蠡、厲以寧、黎鳴、劉曉波、劉東、劉在平、呂英寰、羅子桂、秦曉鷹、榮劍、邵燕祥、孫立平、沈大德、王器、王若水、王逸舟、萬潤南、吳廷嘉、吳知倫、肖國亮、謝雲、謝泳、徐葵、許良英、遠志明、楊春貴、岳麟章、嚴家其、于浩成、張顯揚、張曉剛、張緒文、張宗厚、張明澍、鄭永年、周文彰等人，其中有諸多政治理論界的權威人士；參與報導或刊登討論文章的報刊則有：《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文匯報》、《北京青年報》、《新民晚報》、《理論信息報》、《經濟學週報》、《羊城晚報》、《新觀察》、《天津日報》、團中央《團的情況》、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室內交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室內參閱》、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新聞局《每日動態》、《求是》雜誌內參《內部文稿》、《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內部刊物《未定稿》、《參考消息》、新華社《參考清樣》、美國《紐約時報》、西德《法蘭克福評論報》、香港的有《文匯報》、《明報》、《信報》、《中報》、《香港時報》、臺灣的有《經濟日報》、《聯合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其中絕大部分的文章是反對新權威主義的²²。吳稼祥在北京的多次討論會上一直是眾矢之的，群起而攻之，蕭功秦也說在上海支持其觀點的只有兩個半人。以至於有人諷刺吳稼祥將新權威主義比喻成一隻正在穿越思想界森林的精靈，認為應該說是一隻「過街老鼠」才妥當。

四、論爭後的反思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新權威主義之爭在1989年下半年便偃旗息鼓了。時隔20年，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場論爭並不完全是場意識形態論戰，也不完全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論戰，而是改革派陣營內部穩健派與激進派之間的論戰。雙方爭論的核心問題，不是中國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是政治民主優先，還是經濟自由優先的問題；也不是要不要權威，而是政府的權威究竟應當通過何種方式建立起來。這些問題的不同選擇，一旦付諸實踐，將會導致兩種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和方針大略。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新權威主義之爭中產生的分歧，不是一般性的分歧，而是涉及到改革的性質、對像和方向等重大問題的原則性分歧。

在這場論爭中，新權威主義者雖然處於弱勢，屢屢受到批駁，然而並非一無是處。他們常常遭到誤解，以為只片面強調權威而忽略了民主。事實上，不少主張新權威主義的學者也都是將民主作為最終訴求，同時對權威的濫用也心存警惕。吳稼祥就提出，基於權威政權的兩面性，我們對新權威要保持民主壓力，來防止新權威向舊權威蛻化，「新權威一經產生，對它保持經常性的民主活動的壓力是非常必要的。……防止新權威滑向舊權威的防滑機制不止是民主壓力一種，還有財產所有者壓力、財政壓力和外部社會壓力等多重壓力。」²³蕭功秦在談到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前景時也指出，新權威主義雖然可能發揮其整合社會秩序作用，並向民主政體順利過渡，但因為其借助傳統思想整合社會，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後的傳統社會。為了避免這種危害，就需要發揮社會上中產階級的力量，讓他們來監督政府活動，才有可能避免這種禍害的最終發生²⁴。由此可見，新權威主義者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漠視民主。關於這一點，當時站在批駁新權威主義一方的王逸舟亦表示：「必須承認，新權威主義的提倡者在某些問題上與我們有著共同的認識和結論。……比如，新權威主義者不否認民主政治的終極價值，新權威主義者重視市場經濟的作用，新權威主義者強烈譴責政治與經濟大一統的政治全能主義或國家主義。」²⁵

另外，新權威主義者對改革發展前景的預測也不乏真知灼見。張炳九很早就提出當務之急是使社會生活二重化，即「經濟上，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體制轉換，建立以明確產權為基礎，以組織良好的市場為條件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經濟的全能型政府向間接服務於經濟的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換，建立集權式的政治體制。……這種政府不再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其主要任務乃是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物品，從事宏觀經濟調控、建設社會先行資本等等。」²⁶近十幾年來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相關管理體制的改革，都印證了他的這一判斷。相比較而言，當年慷慨高唱民主者卻不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即使是在他們所擅長的民主建設理論方面。關於這一點，當時就有人反省說：「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維護了民主理論，然而它在批判的同時卻未能對我國目前的民主建設作出建設性的分析和貢獻。」²⁷

當然，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首先，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會帶來市民社會的形成和壯大，但並未意識到市民社會亦需要不斷培養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發形成，因此國家應通過政策性引導，積極培育市民社會這一現代政治的監督力量。而新權威主義者一般都未涉及這一點。其次，新權威主義原本淵源於亨廷頓學說，但亨廷頓後來又修正了其觀點，認為「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發展是很可悲的。僅有很小部分的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成功。所以，採納權威主義制度並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成功。在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在非洲，幾乎所有的權威主義國家實際上發生了經濟倒退；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無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制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要一套特殊條件。」²⁸這對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建構來說，不啻是釜底抽薪。

或許正是因為新權威主義的這種正邪交錯，不少人對之抱有一種微妙的態度。有一位北大著名歷史學教授儘管承認新權威主義是適合我們國情的，但卻不肯寫文章表示支持，他認為新權威主義容易被舊權威生吞活剝地利用，容易被民主戰士嫉惡如仇地誤解，所以不宜公開提倡²⁹。另外據當事人回憶，1988年，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思想界流行的新權威主義思潮時，鄧小平回答說：「我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³⁰

這場20年前圍繞新權威主義展開的論爭雖然已經煙消雲散、沉寂多年，但它可以說是大陸知識界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完全自發的有關中國政治現代化模式選擇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從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到本世紀初幾年的時間裏，國內主流話語雖然不再提及「新權威主義」，但實際上相關的幾次學術討論或是體制改革研究的核心還是新權威主義關注的那些主要問題，只是大家已經跳出了是否應該施行新權威主義的問題框架，開始討論在現有國情下如何運用權威更好地推進改革和現代化進程的實質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權威主義之爭所提出的核心問題——中國在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時代的權威與自由的關係問題，或許仍然是當代和未來幾代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

註釋

- 1 李一蠡：〈現代化·權威·民主——「新權威主義」評析〉，《中國黨政幹部論壇》，1989年第5期。
- 2 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7。
- 3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載劉軍、李林編：《新權威主義一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頁34。
- 4 張炳九：〈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協調〉，《新權威主義》，頁2-3。
- 5 吳稼祥、張炳九：〈激進的民主還是穩健的民主〉，《新權威主義》，頁28。
- 6 蕭功秦、朱偉：〈新權威主義：痛苦的兩難選擇〉，《新權威主義》，頁54-58。
- 7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新權威主義》，頁36。
- 8 吳稼祥：〈新權威：通過市場化開往民主化的特別快車〉，《新權威主義》，頁44。
- 9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新權威主義》，頁35。
- 10 劉在平：〈新權威主義討論綜述〉，《光明日報》，1989年3月24日。
- 11 楊百揆：〈政治發展中的民主和權威〉，《新權威主義》，頁100。
- 12 陳一諮、王小強、李峻：〈建立「硬政府，軟經濟」的發展模式〉，《新權威主義》，頁248。
- 13 劉東華：〈「新權威」不可少〉，《人民日報》，1989年3月10日。
- 14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新權威主義》，頁34。
- 15 榮劍：〈「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世界經濟導報》，1989年1月16日。
- 16 黃萬盛：〈新權威主義批判答問錄〉，《新權威主義》，頁148-161。
- 17 于浩成：〈中國需要新權威主義嗎？〉，《新權威主義》，頁162。
- 18 郭蘇建：〈評新權威主義的誤區〉，《新權威主義》，頁208。
- 19 遠志明：〈新權威主義的三點疑難〉，《新權威主義》，頁250。
- 20 韓水法：〈反新權威主義論〉，《新權威主義》，頁217。
- 21 岳麟章、鄭永年：〈新權威主義與政治民主化〉，《新權威主義》，頁200。
- 22 吳稼祥：〈從新權威到政治民主〉，《你要去哪裡》，2008年第2期。
- 23 吳稼祥：〈新權威：通過市場化開往民主化的特別快車〉，《新權威主義》，頁45-46。
- 24 蕭功秦、朱偉：〈新權威主義：痛苦的兩難選擇〉，《新權威主義》，頁59。
- 25 王逸舟：〈為麼麼不能贊同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頁188。

- 26 張炳九：〈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協調〉，《新權威主義》，頁2。
- 27 郝望：〈過渡性民主權威論綱〉，《新權威主義》，頁270。
- 28 裴敏欣：〈亨廷頓談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頁314-315。
- 29 黃河：〈新權威確立之途徑〉，《新權威主義》，頁103。
- 30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546。

盧 毅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三期 2009年2月28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十三期（2009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